

亲历中国丛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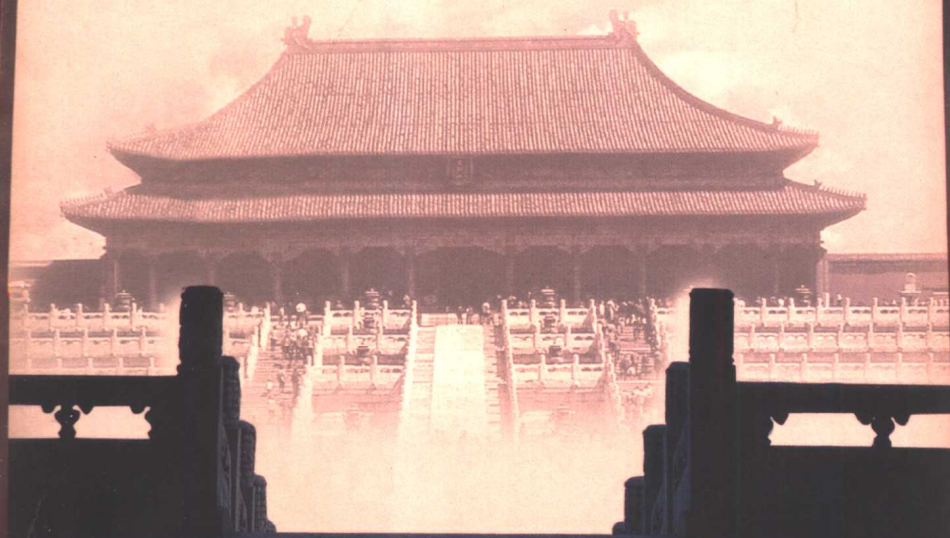
主编：耿昇 李国庆

窥视紫禁城

（俄国）叶·科瓦列夫斯基 著

阎国栋等 译

Путешествие
в Китай



北京图书馆出版社

窥视紫禁城

(俄国) 叶·科瓦列夫斯基 著
阎国栋等 译



北京图书馆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窥视紫禁城/(俄)科瓦列夫斯基著;阎国栋等译.—北京:北京图书馆出版社,2004.7

ISBN 7-5013-2448-4

I.窥… II.①科…②阎… III.游记—作品集—俄罗斯—近代
IV.I512.64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4)第 054129 号

书名 窥视紫禁城

著者 科瓦列夫斯基 著

阎国栋等 译

出版 北京图书馆出版社(100034 北京市西城区文津街7号)

发行 010-66139745, 66175620, 66126153

66174391(传真), 66126156(门市部)

E-mail cbs@nlc.gov.cn(投稿) btsfxb@nlc.gov.cn(邮购)

Website www.nlcpress.com

经销 新华书店

印刷 北京双桥印刷厂

开本 880×1230(毫米) 1/3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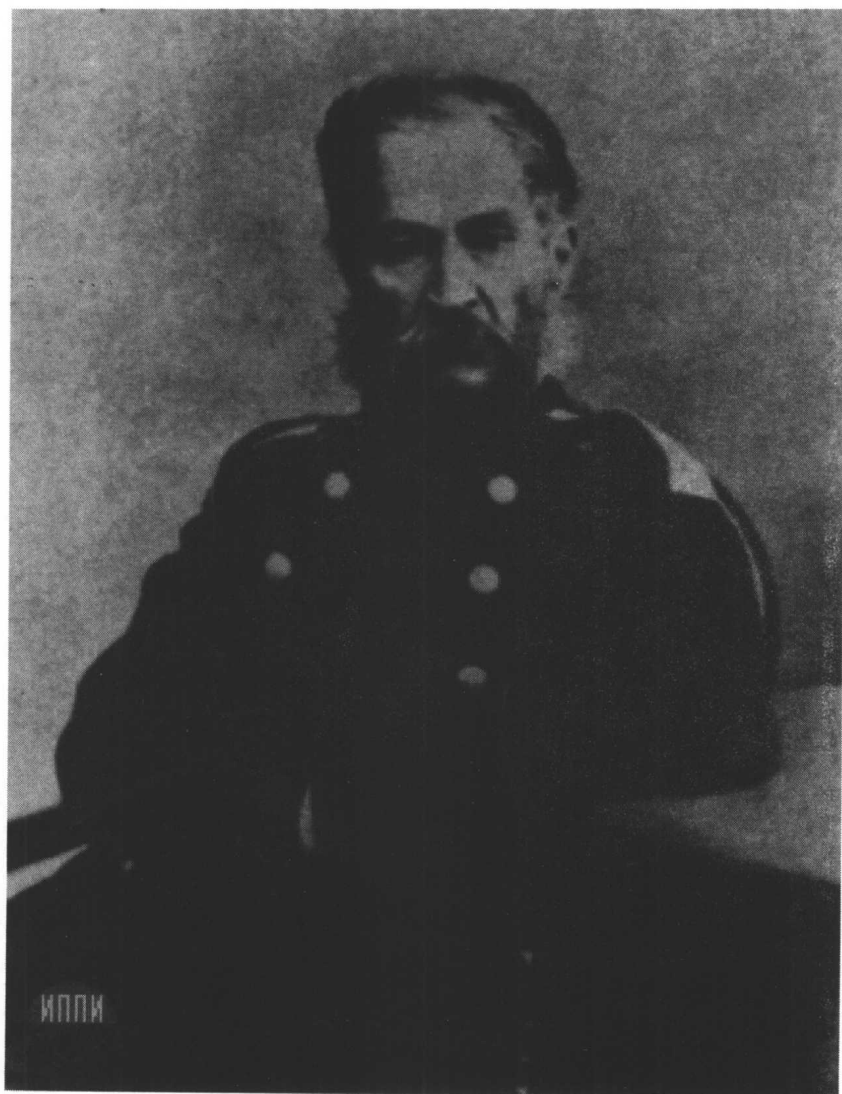
印张 9.25

版次 2004年7月第一版第一次印刷

字数 183千字

书号 ISBN 7-5013-2448-4/K·930

定价 25.00元



作者像

序

外国人来华，大致始于两汉，继之于唐，盛之于元，明清之际出现了大举涌入的先兆，到晚清时期才形成一股巨大潮流。国外发展至今的一门古老而又新兴的学科——海外汉学，其发祥时代的第一阶段，便是“游记汉学”，亦可称之为“记实汉学”(游记、航海记、出使报告、经商报告、日记、札记、书简、考古报告)；其后发展为“宏观汉学”，即译注中文基本经典和全面笼统地介绍中国；最后才发展成经院式的汉学研究，将汉学纳入到了全人类整体的学术研究范畴中。中国人很早就曾出西域、东渡日本或下南洋。外国人也不断来华，与中国社会各界接触。这就是中国人走向世界和了解世界之肇始，同时也是外国人了解中国并与中国人民交往之源缘。不过，两汉时期的外国人入华，主要还是为了朝拜天朝上国、入贡和从事贸易等，尚谈不到科学和学术方面的探讨。

外国人的来华游记，除了日本遣唐使的历次报告之

外，就是元代入华的方济各会士们了。如柏朗嘉宾 (Jean de Plan Carpin, 1182-1252年)，他于1245-1247年出使蒙古并参加贵由汗的登极大典，回国后向教廷提交了《蒙古史》的出使报告。他的使命是游说蒙古人与西方基督教国家结盟以联合对抗撒拉逊人，同时也充当了刺探蒙古人实力的“间谍”角色。他的外交使命彻底失败了，却提供了西方有关亚洲人类学、宗教学和史地学的第一部真正的科学论著。继此之后，又有鲁布鲁克 (Guillaume de Roubrouck, 1215-1270年) 于1253-1255年出使蒙古，鄂多立克 (Odoric de Pordenone, 1286-1331年) 于1318-1328年出使中国，马可·波罗于1271-1295年出使中国，孟德高维诺 (Jean de Mont-Corvin, 1247-1328年) 于1289-1328年任北京大主教等。其中最有影响者，非马可·波罗及其传世名著《寰宇记》(1298年) 莫属。西方学术界有一种说法：“马可·波罗活着的时候发现了中国，死后发现了美洲。”因为哥伦布正是由于在阅读马可·波罗著作时受到启发，为寻找“契丹”和“日本国”，才发现了美洲大陆。这个时期的外国来华人士，必须受中国政府的严格节制。这既是朝贡体制的产物，又具有外交特色，企图与中国结盟而反对其他的政治和经济的潜在对手。南洋与中亚的来华人员，大都是为在朝贡名义的掩饰下经商，西方基督教世界的来华人士当属后者。

外国人大量来华并留下记述者，还是等到明末才开始。这基本与西方史学界所说的“地理大发现”是同时代的，也就是自16世纪之后。这期间的西方来华人士的代表是利玛窦 (Matteo Ricci, 1552-1610年)。他自1582年入华，直到1610年逝世于中国。他留下的那部《基督教远征中国史》，是由金尼阁整理翻译后才出版的 (1615年)。在这个时代，来华的外国人不仅数量大增，而且身份也复杂起来了，身负形形色色的使命。有外交官、传教士、旅行家、探险家、商人等，甚至还有海盗和难民。他们所属的地区，已经不仅限于亚洲和欧洲了，而且还涉及到了非洲和美洲。中国已加快了融入世界的步履。此时来华的外国人，除了为“朝贡”贸易之外，已经出现了殖民主义者蠢蠢欲动的倾向了。但中国的主权还是完整的，外国来华人士无法将他们那一整套目的强加于中国。中国依然为“天朝上国”，既想派人出洋巡视天下，也希望天下诸邦来朝。

到了清朝后期，特别是继鸦片战争和签订一系列丧权辱国的不平等条约之后，中国国门洞开，外国来华人员更多，甚至还形成了外国的“租借地”和“割让地”一类的“国中之国”。中国的边关就如同不设防一般，任人出入。这一方面与西方殖民列强的崛起，疯狂地掠夺和瓜分海外殖民地、西方资本主义也在贪婪地争夺海外市场有关，同时也是中国清政府的国运日衰、腐败无能造成的灾难性局

面。在这个时期的外国来华人士中，大都是在不同程度上和以不同方式与殖民主义的活动相联系。最新奇的是，在大批外国来华人士之中，除了那些传统职业者之外，又多了一批学者式人物：考古学家、史地学家、人类学家、矿业学家、气象学家、动植物学家、建筑师、教育家、艺术家。这个时代的中国，已经失去了往日的辉煌。弱国无外交。清政府不但不能有效地节制这些外国人，甚至还要受制于他们。这与明末和清朝前期的形势相比，已经大相径庭，不可同日而语了。

这些来华的外国人士回国后，或者就在中国（特别是在香港和澳门），大都要写成许多著作：出使报告、信件、游记、考察记、考古报告。他们的这些著作，无论当时是出于什么动机，至今已成了难得的历史资料，成了当时中国的写真。

他们中的许多人，特别是那些学问深奥而又在中国逗留时间较长的人，广泛地与中国各界人士交往，甚至与中国各级官府关系甚笃，直至进入皇宫为朝廷和皇帝本人效力。他们观察问题比较仔细，在各种考察中又动用了当时西方先进的科学方法和手段。他们特别注意搜集口碑传说。他们记录下的许多内容，是中国官修史不屑于记载或不敢记载的（如宫廷斗争等）。这些论述，完全可以补中国史书之阙，起到补史和证史的作用。

在清代，这些来华的外国人，除了殖民主义的政治因

素之外，还有文化与文明上的不同、文化价值上的差异、社会历史背景方面的悬殊，从而造成了他们在有关中国的著述中，既有真实仔细的一面，又有于其有色眼镜之下变形的一面。但这些人中确有是对博大精深的中国文化怀着崇拜的心情，不远万里，甚至是冒着生命危险，漂洋过海地来到中国，站在一种不同的立场上，用一种异域人的目光，来审视中国文明者。心怀恶意者，确有其人；疑惑不解者，不乏其例；更多的人则是在对中国文明误解的基础上，建构了西方人的中国形象和中国观念。

这些外国来华人士，所代表的利益阶级不同，文化层次参差不齐，鉴别和洞察事物的能力也各有所别。许多人来华之前，便听惯那些有关中国的老生常谈，难免有先入为主之嫌。他们有些人在华停留时间不长，有的甚至仅仅是来去匆匆的过客。他们的记述是否会带有成见、歪曲和不实之词呢？这恐怕是我们面对任何历史资料时，都必然会提出的问题。在中国历代封建王朝官修正史时，不是也存在大量为适应统治阶级的利益，而各取所需地作取舍的做法吗？任何历史资料，只要经过人工整理编纂，就不可避免地会带有整理者的立场、观点、愿望的遗痕与色彩，从而给后人带来了大量辨伪的工作。这也是历史研究中的普遍现象。更何况那些洋人呢？中国实施改革开放政策，已有20多年了，中国的读者已经是一个成熟的群体了，完全能够辨别正确与错误，可以通过现象而看到本质。他们

可以区别文化与价值观的差异，也善于区别历史与当代。我们对此不必杞人忧天，过分担心。

学术界许多有识之士，在10年前就曾预言过，中国学术界继文化热之后，必然会出现一股旅游研究和著述热潮。近年来的发展趋势，似乎已经证实了这一点。当代中国人写的游记和考察记、古人游记著作的研究与再版、外国人入华旅行记的翻译出版，已经热热闹闹地哄动了一段时间，目前依然是方兴未艾，大有进一步发展的余地与前途。这种倾向与国外近年来发展起来的注重口传史学、口述史学之类“活史学”的潮流，也基本上是互相吻合的。

外国来华人士的亲历记述，种类繁杂、语种颇多、数量庞大，特别是难以觅寻。无论一个人有多大的学问，他也不可能找到所有这些书，更不可能读懂所有这些语言文字的著作。我国过去曾陆续翻译出版过其中的一些，但毕竟是沧海一粟，实难满足广大读者、科研教学工作者的需要。北京图书馆出版社果断决策，推出了一套《亲历中国》翻译丛书。这实在是一个有远见和有气魄的正确决策，必然会获得圆满成功。这也是出版家为促进科研和教学的发展而做出的一项贡献。

《亲历中国》只收入来华外国人的亲历纪实性著作，包括探险记、笔记、考察报告、出使报告、书简等。内容力求客观、公允、真实，并兼顾其科学性和可读性。在允许的范围内，力求满足中国学术界的需要，填补空白和弥

补不足之处。

本丛书的译文力争达到高水平的信达雅，尽量保持原貌而不作删节。

在《亲历中国》丛书出版之际，笔者应北京图书馆出版社社长兼总编辑郭又陵先生、本套丛书的责任编辑周玉玲先生之邀，草书本序言，以表心意。衷心祝愿这套丛书对于国内学术界理解和认识国外的中国研究，进而借他山之石攻玉，促进本国学术发展，能有裨益，做出贡献。

耿昇

2004年4月20日于京西陋室

译者序

本书作者叶戈尔·彼得罗维奇·科瓦列夫斯基（1811~1868）是近代中俄关系史上的重要人物，在中国史籍中被称为“廓瓦烈福斯启”或“阔瓦劣复斯奇”。他出生于俄国哈尔科夫省的贵族家庭，毕业于哈尔科夫大学。先在俄国矿业司任职，后进入外交部，开始频繁出国旅行，足迹遍及非洲、黑山、罗马尼亚、伊斯坦布尔、中亚和中国等地。1832年起发表剧作和小说。1840年受俄国外交部委派前往新疆的伊犁和塔城一带活动，为俄国政府在我国西部开辟通商口岸刺探情报。1849年科瓦列夫斯基又被俄国外交部任命为俄国东正教第13届驻北京传教士团的监护官，于7月31日从中俄边境贸易口岸恰克图起程，同年10月9日抵达北京。他在北京一共停留了7个月，于1850年7月21日返回恰克图。回国后科瓦列夫斯基立即被沙皇政府任命为特命全权代表，负责对华通商交涉。1851年8月6日，他与伊犁将军奕山和参赞大臣布彦泰分别代表俄中政府签署《伊犁塔尔巴哈台通商章程》，俄国

就此攫取了在中国西北地区的经济贸易特权。这是继中英《南京条约》、中美《望厦条约》和中法《黄埔条约》之后列强强加给中国的又一个不平等条约，也是沙俄逼迫中国签订的第一个不平等条约。1856~1861年科瓦列夫斯基担任俄国外交部亚洲司司长，是俄国在第二次鸦片战争期间攫取我大片领土的罪魁之一。1857年被选为彼得堡皇家科学院通讯院士。他既是外交官和探险家，同时也是作家和学者，集多重角色于一身。

摆在面前的这本书就是科瓦列夫斯基作为监护官于1849~1850年间伴送以巴拉第为首的俄国东正教第13届驻北京传教士团来华时所写的游记。

此书原名为《中国旅行记》，出版于1853年。考虑到此名容易与同类作品雷同，因此改译为《窥视紫禁城》。虽然科瓦列夫斯基早年发表过数部中长篇小说，但影响不大，而他的游记作品却受到了俄国读者的欢迎。《窥视紫禁城》全书分三部分：第一部分为蒙古地区游记，主要记述了驼队在蒙古大漠上的旅行情景。作者在描绘沿途自然风光的同时，对蒙古地区的历史、社会、风俗多有介绍和思考。第二部分为旅行日志，用表格的形式记录了每一站的水草、地貌、温度等数据，可读性较差，因此删去未译。第三部分描写科瓦列夫斯基及传教士团人员在北京的生活和见闻。作者以一个外国人的视角对第一次鸦片战争后的中国社会进行了深入细致的观察，对道光末年的京城

生活百态进行了惟妙惟肖的描绘。

或许是为了窃取情报，或许是出于强烈的好奇心，科瓦列夫斯基总是想方设法去看他想看的地方。为了第二天观看清军火器营的操演，他在前一天就起程前往肥城。为了能看一眼皇宫，他找关系托门子，在一个喇嘛的帮助下进入皇家禁地北海。为了看钮祜禄氏皇太后和道光皇帝出殡，他提前隐藏在店铺中或混迹于兵丁中。他甚至闯进了朝廷的宝泉局铸钱厂和兵器厂“参观”。他在书中描绘了北京的名胜如紫禁城、天坛、先农坛、琉璃厂、汤山温泉、明皇陵、龙泉寺等，同时讲述了许多与之有关的历史和传说，并用很多篇幅介绍北京的民俗风情，如戏剧、杂耍、婚嫁、葬俗、纸花等。此外，作者还单独用两章的篇幅分别介绍了鸦片和茶叶，这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当时世界形势的焦点和俄国读者的兴趣。前者导致了鸦片战争和五口通商，中国沦为任人宰割的半殖民地国家，而后者让中国名扬四海，同时也是中俄间最主要的贸易商品。总之，上至皇亲贵胄，下至流民乞丐，远至上古历史，近到身边日常生活，在科瓦列夫斯基的这本游记中都有生动的描述。

作者虽然不通汉语，但在其身边却有瓦西里耶夫、巴拉第、扎哈罗夫、塔塔里诺夫、固礼、戈什科维奇、佟正笏等在北京居留多年的“中国通”提供协助，这无疑大大增强了游记素材的可信度。正因为如此，无论是皇太后薨

逝后颁布的诏书，还是咸丰皇帝的即位诏书，都在书中有精确而完美的翻译。另外，科瓦列夫斯基精通多种西方语言。从文中我们可以感受得到，他不仅阅读了元代来华的柏朗嘉宾、鲁布鲁克的蒙古游记，更熟悉近代包括《耶稣会士中国书简集》在内的大量西方传教士著作，从中汲取了许多有价值的材料，并在现实观察过程中加以比照和阐释。

在翻译这本书的过程中，译者始终感觉仿佛是在观看一部清朝道光年间拍摄的关于蒙古风光和京城生活的大型记录片。摄影机后是俄国人，镜头里却是中国人。既然是一部外国片子，其中的思想也必然与国人有差异，更何况这部片子的“导演”科瓦列夫斯基是俄国外交部的官员，后来又做了亚洲司的司长。所以，当我们看到其中某些观点不仅与我们不同，有时甚至对立时，必须以冷静的头脑加以分析和辨别。

据译者考证，书中插图均为奇穆托夫所绘。此人早年毕业于圣彼得堡美术学院，1849年被编入俄国东正教第13届驻北京传教士团，在北京生活了8年。他共有8幅画作流传于世，其中4幅被科瓦列夫斯基用作此书插图。

此书虽然篇幅不大，但由于年代久远，且途中经过人烟稀少的蒙古地区，文中掺杂了许多满文、蒙古文地名、人名及其他少数民族语汇。此外，在作者从西文著作摄取的材料里，个别专有名词的发音在从中国南部方言到西文

又到俄文的转译过程中严重“失真”。这些都给翻译造成了一定困难。参加此书翻译的吴贺、李莉华、陈金鹏为此付出了很大努力。他们都是我的研究生，此次翻译实践活动不仅有助于提高他们翻译中俄关系史乃至俄国汉学著作的能力，而且也将成为他们在南开求学期间的珍贵回忆。译者具体分工如下：

阎国栋：译者序；第一至五章。

吴贺：第九至十一章；第二十至二十四章。

李莉华：第六至八章；第二十五至二十九章。

陈金鹏：第十二至十九章。

最后由我审订了全稿，吴贺参加了文字校对工作。

文中注释如无特别说明，均为译者所加。

由于译者水平有限，其中疏漏和错讹在所难免，恳请读者批评指正。

阎国栋

2004年1月30日于南开园

目 录

1 / 第一章 集结出境

俄中最初关系——北京传教士团——俄中条约

12 / 第二章 涉谷越岭

伊罗河——我们与汉蒙护送官的关系——送部分哥萨克返俄——厄鲁特卡尔梅克人——敖包

20 / 第三章 牧人本色

图木盖梁——霍里木图——图撒拉克齐游牧区——蒙古人围猎今昔——蒙古人的婚姻以及喇嘛的作用——会见有学问的喇嘛——蒙古文字——临近库伦

29 / 第四章 库伦见闻

库伦河谷——驿馆——拜访高官并与之会谈——昂邦为我们设宴——库伦及其庙宇——商卓特巴与呼图克图葛根——库伦买卖城

36 / 第五章 蒙古今昔

离开库伦——土谢图汗的游牧地——蒙古的幅员与居民——蒙古的政治与历史

43 / 第六章 穿越戈壁

蒙古途中的最后一条河——草木萧瑟——走进戈壁——蒙古人的歌舞——成吉思汗的传说——改